

雲岡石窟



# 云冈石窟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李治国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冈石窟/李治国编. - 2版. -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8

ISBN 7-80065-690-X

I. 云… II. 李… III. 云冈石窟-画册 IV. K87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763 号

云 冈 石 窟

山西云冈石窟文研所·李治国 编

人 民 中 国 出 版 社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二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1.25

ISBN 7-80065-690-4/J·112





# 目次

专文	云冈石窟艺术——李治国	6
图版	云冈石窟全景	20
	第1窟	24
	第2窟	28
	第3窟	30
	第4窟	35
	第5窟	36
	第6窟	46
	第7窟	65
	第8窟	74
	第9窟	77
	第10窟	85
	第11窟	97
	第12窟	106
	第13窟	115
	第14窟	123
	第15窟	124
	第16窟	126
	第17窟	130
	第18窟	132
	第19窟	141
	第20窟	143
	第21窟及西部诸窟	149
	图版说明	161
	云冈石窟大事记	173



# 云冈石窟

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李治国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冈石窟/李治国编. -2 版.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8

ISBN 7-80065-690-X

I. 云… II. 李… III. 云冈石窟-画册 IV. K87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763 号

**云 冈 石 窟**

山西云冈石窟文研所·李治国 编

**人 民 中 国 出 版 社**

(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1.25

ISBN 7-80065-690-4/J·112







# 目次

专文	云冈石窟艺术——李治国	6
图版	云冈石窟全景	20
	第1窟	24
	第2窟	28
	第3窟	30
	第4窟	35
	第5窟	36
	第6窟	46
	第7窟	65
	第8窟	74
	第9窟	77
	第10窟	85
	第11窟	97
	第12窟	106
	第13窟	115
	第14窟	123
	第15窟	124
	第16窟	126
	第17窟	130
	第18窟	132
	第19窟	141
	第20窟	143
	第21窟及西部诸窟	149
	图版说明	161
	云冈石窟大事记	173

# 云冈石窟艺术

李治国



第6窟后室中心塔柱南面上层立佛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龕252个，根据山势的自然起伏，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4个窟(1—4窟)，中部9个窟(5—13窟)，西部32个窟(14—45窟)。云冈石窟现存大小造像51000余尊。最大的高17米，最小的仅有0.02米。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也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云冈石窟已成为中外人士倾慕和向往的旅游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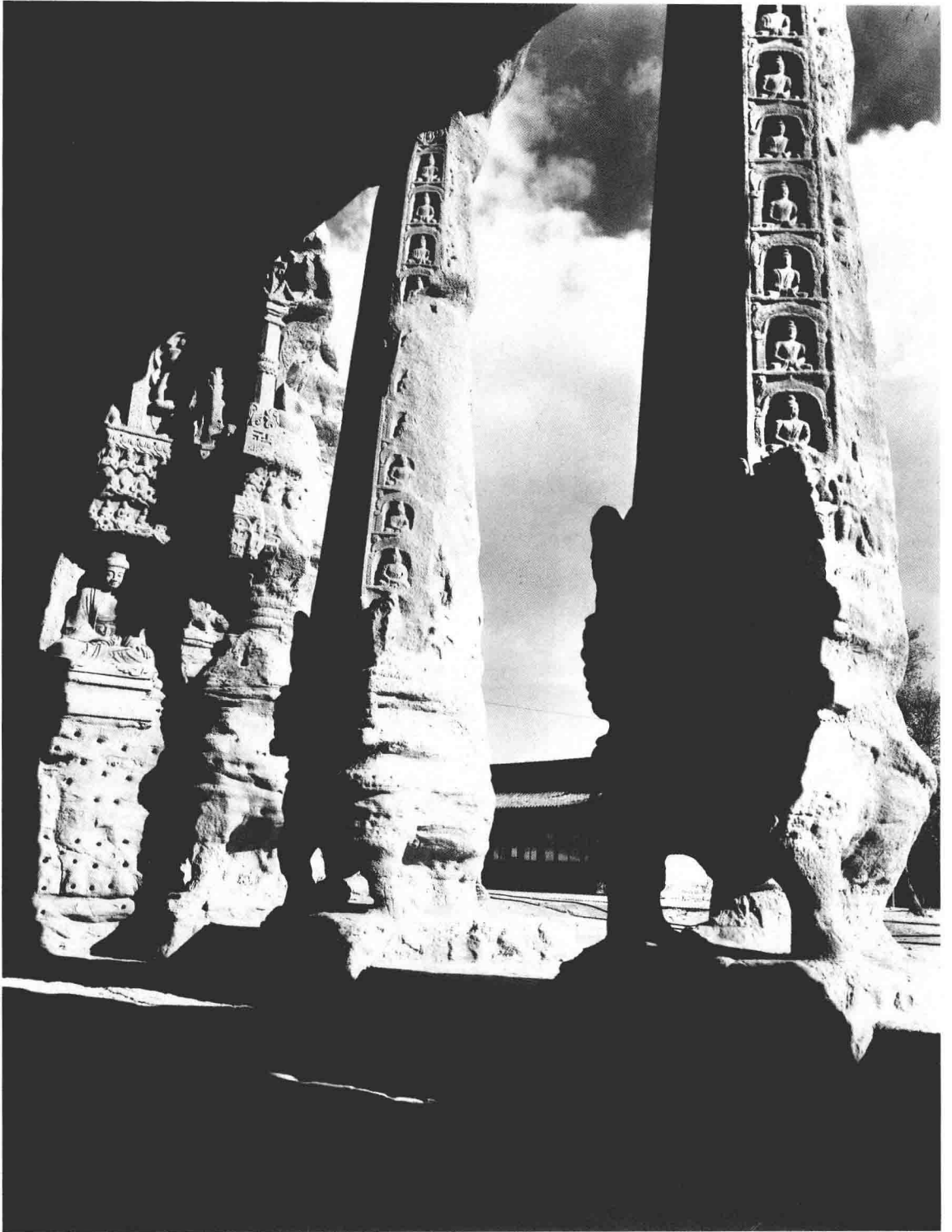
第9窟后室明窗西侧伎乐天

## 一 历史沿革与石窟开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数千年来，发展统一始终是历史长河的主流，民族团结和融合始终是历史前进的特征。云冈石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艺术成果。

公元4世纪末，中国北方正处在各少数民族割据争战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此间，以拓跋珪为首领的鲜卑族拓跋部逐渐崛起。拓跋鲜卑的祖先原是居住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族的一支，公元1世纪末，乘占据北方草原的匈奴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之际，他们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移动，进行了第一次大迁徙。其后百年，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迁徙，长途跋涉到达现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阴山一带定居发展，并日渐强盛。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正式建国称帝，立国号为“代”，后改称“魏”，史称北魏。又经过10余年的努力，拓跋珪在威服塞北各族，占领今山西、河北广大地区后，为了统治和继续向中原发展的需要，于公元398年将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

大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



第9窟前室东壁及列柱



第11、12、13窟外景

前221年),属赵国雁门郡管辖。秦时大同仍属雁门郡,它的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西汉初,改置平城县。平城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武周塞扼据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据天下之背”(《读史方輿纪要》卷44《山西·大同府》),实为战略要地和中原地区的北大门。拓跋珪迁都平城之后,这里便成为鲜卑拓跋部的根据地。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起,经历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帝66年东征西讨,先后降柔然、荡漠南、吞北燕、灭北凉,结束了十六国长期割据的历史,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随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卷4《世祖纪下》),我国北方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到来,向魏都平城大规模的移民和建设同时展开。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494年魏孝文帝再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的首都和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96年之久。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北魏实现了祖国北方的统一,产生了魏孝文帝拓跋宏这样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政治家,由他颁布的均田制、三长制、班禄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北魏进入了“四方无事,国富民康”(《魏书》卷19《任城云玄传附元顺传》)的繁荣阶段。鲜卑族拓跋部是一个善于吸收汉文化等先进文化的民族,提倡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建都平城时期,正是北魏政权革故鼎新,具有新鲜活力的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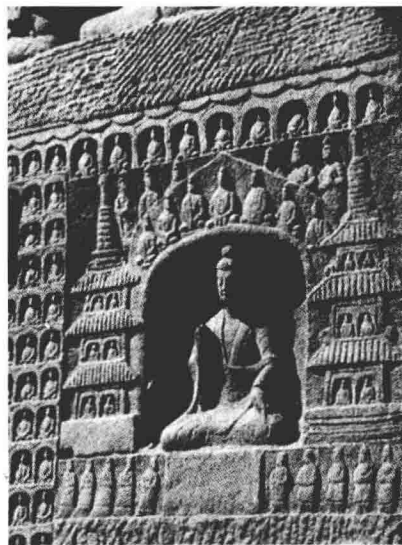
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云冈石窟便是北魏王朝为宣传佛教教义而营建的宏伟工程。

佛教源于印度。公元1世纪即我国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经陆路传入中原,经过长期不断的演变,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佛教日益适应华夏民族的特点,逐渐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汉代的统治者普遍信奉道教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因外来的佛教教理也能被视为“清虚无为”之道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故逐渐为帝王所崇尚。东晋十六国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大力提倡佛教,而历经长年战乱、生活维艰的劳动大众也希冀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这就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十六国时北方的佛教活动相当隆盛。

北魏皇帝崇尚佛教经历了一段漫长过程。文献记载,鲜卑拓跋部在北方一带游动时,还未信奉佛教,而流行各种杂卜巫术。北魏政权建立,逐步接触了中原地区佛教后,才开始予以注意。道武帝拓跋珪既好黄老,信奉道教,也阅读佛经,礼敬名僧。他在攻占河北、山东一带后,“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犯”(《魏书·释老志》)。准许已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继续传播,下诏在京城(大同)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请赵郡沙门法果担任道人统,统辖僧徒。法果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魏书·释老志》)。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被北魏佛教界长期继承,因而为加强和巩固佛教的北魏国教地位提供了保障。明元帝拓跋嗣亦如其父,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今甘肃张掖、平凉一带),使凉州佛教东传,迎来了北魏佛教的兴盛期。

以鲜卑拓跋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势必要从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寻求出路。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修塔建寺,象教弥增。僧人众多,甚至妨害了国家扩充兵源,长安的寺院内还私藏兵器财物。于是中国原有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之间斗争日益尖锐。佛、道之争,演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诏毁灭佛法,致使“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

第11窟南壁明窗西侧壁下层佛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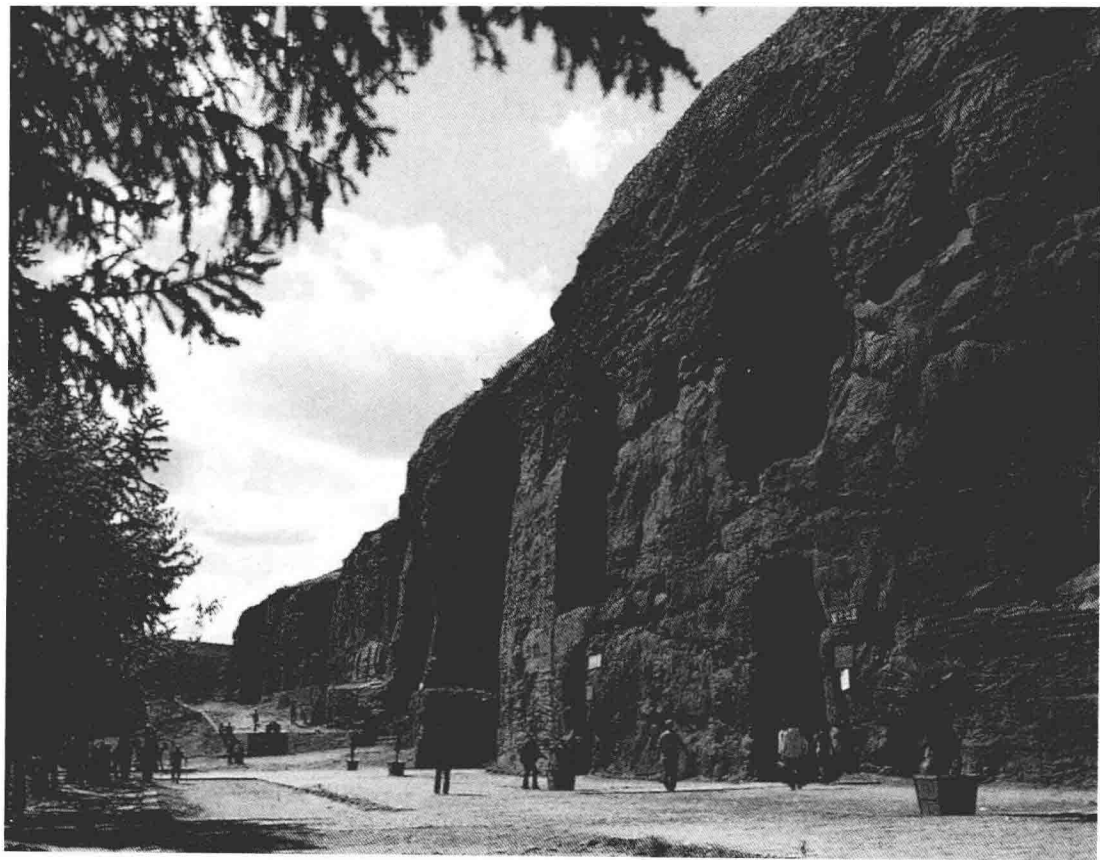


毕毁”(《魏书》)。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便下诏复法,佛教便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就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自明元帝起,武周山成为历代北魏皇帝祈福的神山,明元帝等曾先后七次到武周山祈祷。文成帝在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接受高僧昙曜的建议,并批准由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这就是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16—20窟)。

当时的平城作为我国北方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包括凉州僧徒三千人,吏民、工匠三万户,以及先后从山东六州、关中长安、东北及龙城等当时北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迁移到平城的数十万人口,他们中间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高僧。北魏皇室以其国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证,开始了大规模的云冈石窟开凿工程。

第17、18窟外景及  
西部诸窟远望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公元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止,前后60多年。按石窟的形制和造像风格,可分作三期:

第一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公元460—465年,为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

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公元470—494年,主要石窟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7、8窟,9、10窟,5、6窟,1、2窟),一组为三个窟(11—13窟)。

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约公元494—524年,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中小窟龕自东迄西遍布崖面(4、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部小窟,4—6窟间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

上述第一、二期石窟为皇室主持开凿,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第三期石窟多为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官僚地主、善男信女以及少数民族统治集团所营造。

云冈石窟的开凿耗资巨大,工程宏伟,凝聚了北魏各族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成为中国宗教史和艺术史上的辉煌巨作。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述道:“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续高僧传·昙曜传》形容说:“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龕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人许,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龕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此后的东魏、北齐、隋至唐初,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由当地守臣对云冈石窟个别洞窟进行修建。3窟后室的三尊“西方三圣”大像,可能即为初唐雕刻。此时云冈石窟曾一度繁盛,《广弘明集》记述:“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龕,容千人……石窟中七里极高峻,佛龕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可见云冈盛况一斑。

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鯨